

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建弘題記與華嚴十方佛研究

香港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博士生
釋德存（熊燁）

摘 要

炳靈寺 169 窟作為西秦與北魏時期河西走廊一帶最具研究意義與影響力的石窟之一，其展現的內容極其豐富。在 169 窟的第 6 龕中，即有迄今為止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西方三聖像，也保存著中國石窟寺中現存最早的造像題記。在西方三聖像與造像題記中間偏上部分有十方佛的造像與題名，這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與研究。本文首先會介紹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與建弘題記的周圍環境、相關題材以及當時、當地佛教傳播的概況。之後會重點討論建弘題記附近的十方佛像與題名，以及第 6 龕中十方佛剎的來源。在對比多個版本相關的十方佛以及相關的歷史資料後，本文在參考建弘題記的時間、內容，第 6 龕的題材，以及華嚴經學傳播概況的情況下，認為第 6 龕中的十方佛剎應當是依據晉譯《華嚴經》所造。在文章的最後，筆者會初步討論建弘題記附近出現十方佛剎相關內容的原因以供讀者思考。

關鍵字：炳靈寺、建弘題記、十方佛、華嚴經、造像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炳靈寺位於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西南約 30-40 公里處的小積石山中。根據相關的記載，其開鑿年代大致從十六國時期，一直延續到了明、清。¹ 雖然炳靈寺石窟開鑿跨度的年代很長，但就石窟的分期而言，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北朝時期、初唐（包括隋朝）與盛唐時期、中晚唐時期、宋至明清時期。就北朝時期而言，也有學者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劃分，並且將 169 窟單獨作為北朝時期開鑿的第一個階段。² 這也凸顯了 169 窟作為炳靈寺最具代表性石窟的重要性。

從歷史上看，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河水二》中就有著相關的記載：「河北有層山……下層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因謂之積書崖……彼羌目鬼曰唐述，複因名之為唐述山。其懷道玄宗之士，皮冠淨發之徒亦往棲焉。」³ 這裡的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北，其中的唐述窟就是現在的炳靈寺石窟。《水經注》中提到的「懷道玄宗之士，皮冠淨發之徒」就是對當時、當地出家人的描述。其中的「下層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指的便是炳靈寺 169 窟。筆者曾於 2020 年 10 月前往炳靈寺考察。考察的重中之重也是 169 窟（見圖一）。從石窟寺下方的水泥道前往 169 窟時，需要攀爬多層較為陡峭狹窄的木質結構棧道。雖然這一棧道為近幾十年重新建造，但 169 窟即使經歷了 1600 多年，仍與《水經注》的描述基本一致。

本文的重點是討論 169 窟第 6 龕的建弘題記及其左上方的十方佛壁畫與題名。從 90 年代起，已有學者陸續對 169 窟進行了各個角度的分析。就建弘題記而言，張寶璽在結合其他學者錄文的基礎上對題記的內容重做了識讀，並且大致識別出了 230 餘字。除此之外，也對題記以及周邊壁畫的內容根據不同的題材進行了分類。⁴ 就張寶璽所持建弘題記應為西元 420 年所造之觀點，王惠民認為雖然題記中的建弘元年（西元 420 年）可以被識別，但是以「玄枵」作為紀年依據應該更加可靠。同時，王惠民也將晉譯《六十華嚴》的翻譯年代作為佐證來證明建弘題記的創作時間應該是建弘五年而非建弘元年。⁵ 魏文斌更加認可張寶璽的觀點。他提出「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出現筆誤的可能性不大，「玄枵」即「子」的

¹ 請參見：祁永龍，《淺析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第 113 頁。

² 有關炳靈寺北朝分期的進一步劃分，請參見：陳海濤、劉惠琴，《炳靈寺石窟及其三個重要階段》，《西北史地》1994 年第 4 期，第 51 頁。

³ 酈道元，《水經注》，商務印書館發行，1929 年版，第 16-39 頁。

⁴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1-20 頁。

⁵ 王惠民，《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67 頁。

意思，「子」即代表元年，因此 169 窟中的年代應當是建弘元年。⁶ 曹學文、丁萬華近期對有關建弘題記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其中列舉了六個版本的錄文與識讀，並且對建弘題記年代的兩種觀點進行了分析。文章的最後，作者提出目前鮮有學者將炳靈寺石窟與河州當地的文化進行聯繫，這也可能是今後研究的一個方向。⁷ 莊希祖從書法的角度簡要分析了建弘題記的重要意義。作者根據題記與其他文字的特點提出一個假設：「題記是南方高僧書家所為，而其它為北方書家所為。」⁸ 當然，作者也認為題記可能出自于僧人之手。這兩種觀點似乎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除了建弘題記之外，也有諸多學者對 169 窟中十方佛這一題材的壁畫或題名中佛剎的名號進行了研究。馬德重點參考了 30 卷本《佛說佛名經》出現的 40 多組十方佛中帶有「智」的佛號，然後與第 6 龕中的十方佛名進行了比對。這一論點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於《佛名經》的各個版本並非一致，且 30 卷本的出處仍存疑惑，所以這一觀點的說服力還有待驗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似乎選擇性的忽略了晉譯《華嚴》中的十方佛與第 6 龕中十方佛兩者之間的高度一致性。此外，作者依據敦煌寫本《十方千五百佛名經》試圖連接了第 6 龕中十方佛與千佛的關係。這一觀點也需要補充其他的證據才能證實。⁹ 張寶璽通過對比晉譯《華嚴》與第 6 龕中佛像側面的題名，認為兩者之間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魏文斌在張寶璽與馬德的基礎上，將第 6 龕中的題名、晉譯《華嚴經》中《如來名號品》的文字、還有馬德所依據《佛名經》的文字做出了對比。雖然作者更加傾向于張寶璽的觀點，但是論證過程中並沒有過多的考慮早期淨土信仰與《華嚴經》之間的關係。就「十方三世佛」而言，賴文英也做出了相關的論述，但其重點放在了北魏的 126、128，以及 132 號窟。西秦時期所造的 169 窟中第 6 龕的十方佛壁畫與題名並未引起作者足夠的重視。¹⁰ 梁燕重點分析了建弘題記附近的壁畫題材。雖然作者的出發點是第 6 龕，但其分析的內容卻集中到了第 11 龕和 12 龕。¹¹ 其他作者在分析第 6 龕的相關壁畫時，基本上都聚焦於彌陀三聖像上，而忽視了附近十方佛像的相關內容。

⁶ 魏文斌，《關於炳靈寺石窟研究的幾個問題》，《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第 128 頁。

⁷ 曹學文、丁萬華，《炳靈寺石窟第 169 窟「建弘題記」研究述評》，《敦煌學輯刊》，2020 年第 3 期，第 92-103 頁。

⁸ 莊希祖，《炳靈寺石窟題記的意義》，《中國書法》，2011 年第 2 期，第 123 頁。

⁹ 馬德，《炳靈寺第 169 窟 6 號龕「十方十智佛」臆測》，《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第 93-99 頁。

¹⁰ 賴文英，《論炳靈寺北魏石窟的「十方三世佛」——以 126、128、132 窟為例》，《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下）——2002 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第 332-347 頁。

¹¹ 梁燕，《炳靈寺 169 窟北壁畫塑源流》，《中國美術研究》，2018 年 02 期，封二、封三。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有諸位學者對建弘題記的文字以及附近的十方佛像做出了識別與說明。這些議題大多集中在二個方面：(1) 建弘題記的年代。(2) 十方佛名的來源。但是，鮮有作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為什麼在淨土為主題的佛龕內會出現與《華嚴經》密切相關的十方佛像與題名。早期的華嚴內容為什麼在西元 420 年前後出現在北方這一石窟中？這些問題都會在本文中有所涉及。

二、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的建弘題記及相關壁畫題材

(一) 建弘題記的介紹

根據相關圖冊資料的介紹¹²，結合本人 2020 年對炳靈寺特別是 169 窟的實地考察，在 169 窟的第 6 龕附近牆面上存在一處非常明顯的題記（見圖二）。根據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的介紹，「題記高 0.47 米，寬 0.87 米，500 餘字，內容為第 6 龕造像發願文，末書『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建弘題記』是迄今中國石窟中發現最早的紀年題記……。」¹³ 至今為止，這是中國境內發現的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造像題記。

當筆者在 169 窟實地考察時，發現題記有近一半的內容侵蝕嚴重。比較難以辨識的內容主要集中在題記的前半部分（題記的右側）；而題記後半部分的文字（題記的左側）則相對保存完好，其大致內容依然可以識別。建弘題記上的最後一句（最後一豎排）中明確的記載了造像題記的時間，即：「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其中的建弘元年指的是西秦（西元 385 年～400 年、西元 409～431 年）建弘元年，可以非常明確是西元 420 年。歲在玄枵指的是西元 424 年。這一時期炳靈寺一帶屬於十六國時期西秦政權第三位君主乞伏熾磐的統治之下。根據張寶璽的實地勘測與研究¹⁴，169 窟建弘題記中（包括建弘題記附近相關的壁畫與題名）大致出現了十方佛、三世佛、彌勒、華嚴、供養人等題材。那麼在這一時期，炳靈寺與河西走廊一帶到底受到了哪些佛教思想的影響才會出現如上所述的多種題材呢？

¹² 有關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建弘題記的圖片，請參見：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57 頁。或參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出版，1989 年版，第 21 頁。

¹³ 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57 頁。

¹⁴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1-20 頁。

（二）西元 4 世紀末期到 5 世紀初期河西走廊一帶的佛教思想

首先，建弘題記與相鄰壁畫的相關內容都顯示當時、當地的佛教受到了大乘思想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大乘佛教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傳播與大乘思想在這一地區的影響直接顯示到了炳靈寺 169 窟的相關題記與壁畫之中。

根據呂澂先生的論述，大乘佛教在印度的起源時間還很難確定，但是大乘佛教的起源是與大乘經「相伴而來」。¹⁵ 呂澂先生認為大乘經的起源大約在西元 1 世紀。¹⁶ 在筆者看來，河西走廊地區大乘佛教的起源依然是隨著大乘經典的傳播與翻譯而來。大乘經典在河西走廊的傳播，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議題。它涉及到西元 2-4 世紀游走於印度、西域與中原地區多位譯經師的生平以及思想，且在細節上依然有諸多爭議，本文在此不做贅述。於此同時，毗曇特別是有部的經典與思想在這一地域也有所流傳。但是，就西元 4 世紀末期至 5 世紀初期炳靈寺 169 窟所體現的內容而言，筆者認為它們大致受到了兩類經典的影響。

首先，根據學者的判斷，炳靈寺 169 窟整體而言是一個禪窟。¹⁷ 因此，169 窟的開鑿肯定會受到早期禪法的影響。這裡所提到的早期禪法，並非等同於大乘禪法，這與此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天臺宗或者禪宗的修行方式有著較大的差異。這裡的禪法，更多的指向於禪觀或者是觀法。這類修行方式與一些講述禪法的早期經典都有著密切的聯繫，例如鳩摩羅什於 5 世紀初期在長安翻譯的《禪祕要法經》¹⁸、《坐禪三昧經》¹⁹、《思惟略要法》²⁰等。這類經典對西秦與北魏時期河西走廊一帶早期禪窟的建造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從唐代起逐漸發展出的各個宗派中的修行方式，早期禪法對觀佛的方法與過程都更加重視。隨著道安、羅什等僧人對早期禪法經典的翻譯，這一時期河西走廊一帶的禪窟也逐漸興盛。169 窟作為一個典型的禪窟，不論是其建築結構、佛龕內容，還是建造目的都與早期禪修經典關係密切。

除此之外，由於 169 窟中大乘佛教的內容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也是這一時期大乘思想在河西地區傳播的具體體現之一。例如：第 6 龕的主題就是無量壽佛三聖，第 6 龕中既有三聖像的整體佈局，也在彌陀背光中描繪了非常生動、形象的天女與歌舞等內容。這些具體的內容，在 4 世紀末期到 5 世紀初期所翻譯的淨土經典中都能夠找到具體的依據。其他的題材例如：彌勒，三世佛、十方佛等，也

¹⁵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年版，第 75 頁。

¹⁶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年版，第 75 頁。

¹⁷ 關於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請參見：祁永龍，《淺析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第 113-115 頁。

¹⁸ 《禪祕要法經》 CBETA 2019.Q3, T15, no. 613.

¹⁹ 《坐禪三昧經》 CBETA 2019.Q3, T15, no. 614.

²⁰ 《思惟略要法》 CBETA 2019.Q3, T15, no. 617.

可以在當時傳播的大乘經典中找到相對應的來源。因此，筆者認為 169 窟第 6 龕（也包括其他龕）受到了以上兩類經典的共同影響。

三、建弘題記左上方相鄰壁畫中的十方佛

上文簡要的介紹了建弘題記的內容與 169 窟第 6 龕中所體現的相關題材，其中大部分的題材例如十方佛、三世佛、彌勒、華嚴、供養人等都與大乘佛教在當時、當地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第 6 龕建弘題記的左上方，有著比較清晰的十方佛壁畫。除了部分壁畫受到侵蝕外，在每一個小佛像壁畫的上側，都可以識別出佛刹的方向與佛號名稱的題名。（見圖三）因此，十方佛刹與題名源自何部經典便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169 窟第 6 龕中十方佛的名號與方向識別

在此類石窟中，壁畫旁的題名對識別這一題材的內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第 6 龕中出現的十方佛而言，十方佛像皆為坐像，且大小、姿態、間隔、色彩、繪畫方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見圖三與圖四）。如果沒有相關的題名在側，我們幾乎沒有方法來識別出十方佛的具體內容以及造像的來源或依據。因此，在這一環境中，對題名內容的分析特別是對題名內容來源的分析顯得至關重要。

十方佛，本身就是大乘佛教的顯著特徵與表現形式之一。在大乘佛教的興起階段，大乘經典的傳播與翻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西元 4 世紀末期至 5 時期初期河西走廊一帶大乘佛教的傳播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域，特別是古代新疆，龜茲，於闐等地。在這一時期，不論是淨土、法華，還是華嚴等各類經典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十方佛的相關內容。但是，各類經典中十方佛的方向與佛的名號都有著顯著的區別。根據實地考察與圖片資料的顯示，筆者可以大致可以識別出十方佛中的七個佛名與方向（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南方智火佛、西方習智佛、北方行智佛、西南方上智佛、西北方自在智佛、下方梵智佛、上方伏怨智佛。²¹ 筆者的識別與張寶璽的錄入與比對也是基本相同的。根據張寶璽的發現，第 6 龕中十方佛刹的方向與佛的名號與佛陀跋陀羅所譯《華嚴經》中《如來名號品》的內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²² 除此之外，晉譯《華嚴》中有關十方佛刹的描述也是結跏趺坐的坐姿，這種姿勢與第 6 龕中十方佛壁畫的姿勢也保持了一致。

²¹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1，敦煌麥積山 炳靈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3 頁。

²²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2-13 頁。

(二) 《華嚴經》中的十方佛刹引起的思考

《華嚴經》的傳譯經過了大約 5 個世紀，在華嚴本部第一次譯出之前，已經譯出了多部支品經、節譯經、眷屬經等。其中明確涉及到十方佛號的，就是後漢支婁迦讖翻譯的《佛說兜沙經》。

1. 晉譯《華嚴經》中的十方佛刹與《兜沙經》中的十方佛刹

晉譯《華嚴經》的《如來名號品》中提到了佛陀在普光法堂的蓮華藏師子座上宣講了十個方向十佛刹微塵數國的世界名稱、佛陀名號、菩薩名號、佛刹方向等資訊：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即如其像，現神通力。現神力已，東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色，佛號不動智，有菩薩字文殊師利，與十佛土塵數菩薩來詣佛所，恭敬供養，頭面禮足，即於東方，化作蓮華藏師子之座，結跏趺坐。

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樂色，佛號智火，有菩薩字覺首……

西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華色，佛號習智，菩薩字財首……

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蒼卜華色，佛號行智，菩薩字寶首……

東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青蓮華色，佛號明智，菩薩字德首……

東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色，佛號究竟智，菩薩字目首……

西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寶色，佛號上智，菩薩字進首……

西北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剛色，佛號自在智，菩薩字法首……

下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玻瓈色，佛號梵智，菩薩字智首……

上方過十佛刹微塵數國，有世界名如寶色，佛號伏怨智，菩薩字賢首……²³

對比後漢支婁迦讖所譯的《兜沙經》：

佛悉知諸菩薩心所念，佛悉現光明威神。

東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逝墮，其刹名訖連桓。文殊師利菩薩從是刹來，與諸菩薩俱——數如十方刹塵——皆前為佛作禮，各各于自然師子座交路帳中坐。

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泥羅墮羅，其刹名樓耆洹。佛陀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²³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CBETA 2019.Q3, T09, no. 278, pp. 418b18-419a1)

西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斯墮陀，其刹名波頭洹。羅鄰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闍墮，其刹名占倍洹。檀那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東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輸那墮國陀，其刹名優彼洹。群那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東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旃陀墮陀，其刹名捷闍洹。那涅槃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西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鬱沈墮大，其刹名羅憐洹。惟闍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西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阿波羅墮，其刹名活逸洹。曇摩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下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楓摩墮羅，其刹名潘利洹。憍那師利菩薩從是刹來……

上方極遠不可計佛刹有佛，佛名墮色，其刹名價提拾洹。那鞞陀師利菩薩從是刹來……²⁴

2. 169 窟第 6 龕中十方佛刹的溯源

對比如上兩個版本，不難發現二者描述十方佛刹的方向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從東方、南方，一直到最後的下方和上方。但是兩個版本中佛陀的名號與相對應菩薩的名號都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外，《佛說佛名經》²⁵(失譯 30 卷本)中也有多個版本的佛號與第 6 龕中的佛號重合，但是在《佛名經》中，東北方佛刹出現在西北方之後，而不是晉譯《華嚴經》與《兜沙經》中的西南方佛刹之後。

表格一：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十方佛來源對比

169 窟第 6 龕識別佛號 ²⁶	晉譯《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中的十方佛	《兜沙經》中的十方佛	失譯版本《佛說佛名經》的十方佛 ²⁷
東□□□□	東方佛號不動智	東方佛名阿逝墮	東方多智佛
南方智火佛	南方佛號智火	南方佛名阿泥羅墮羅	南方大集佛
西方習智佛	西方佛號習智	西方佛名阿斯墮陀	西方習智佛

²⁴ 《佛說兜沙經》：(CBETA 2019.Q3, T10, no. 280, p. 445b14-c25)

²⁵ 《佛說佛名經》：(30 卷本) CBETA 2019.Q3, T14, no. 441.

²⁶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2-13 頁。

²⁷ 這一版本的佛號是馬德根據 30 卷本《佛名經》中三組十方佛綜合而來。請參見：馬德，《炳靈寺第 169 窟 6 號龕「十方十智佛」臆測》，《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第 9 頁。

169 窟第 6 龕識別佛號 ²⁶	晉譯《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中的十方佛	《兜沙經》中的十方佛	失譯版本《佛說佛名經》的十方佛 ²⁷
北方行智佛	北方佛號行智	北方佛名阿闍墮	北方行智佛
東北方明智佛	東北方佛號明智	東北方佛名阿輸那墮國陀	東北方明智佛
東南方□□□□	東南方佛號究竟智	東南方佛名阿旃陀墮陀	東南方究竟智佛
西南方上智佛	西南方佛號上智	西南方佛名鬱沈墮大	西南方上智佛
西北方自在智佛	西北方佛號自在智	西北方佛名阿波羅墮	西北方自在智佛
下方梵智佛	下方佛號梵智	下方佛名楓摩墮羅	下方梵天智佛
上方伏怨智佛	上方佛號伏怨智	上方佛名墮色	上方伏怨智佛

表格一中多個版本的十方佛是目前已知文獻中與第 6 龕十方佛題名相似度最高的幾處來源。不論是從建弘題記所標明的年代（西元 420 年或者西元 424 年），還是從晉譯《華嚴》的翻譯時間以及譯者在當時的活動軌跡來看，筆者認為炳靈寺建弘題記附近所出現的十方佛號與晉譯《華嚴》的翻譯很難說是偶然。因此，就目前已知的證據，筆者認為 169 窟第 6 龕的十方佛題名最可能是依據佛陀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中的《如來名號品》所作，原因如下：

- (1) 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建弘題記的時間與佛陀跋陀羅翻譯《華嚴經》的時間高度吻合。建弘題記本身就是造像題記，題記末尾處注明撰寫題記與造像時間也是最為通行的做法。建弘題記最後一豎行明確記錄到：「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就這一時間而言，有學者認為應該採用「建弘元年」²⁸，也有學者認為應當用「玄枵」來判定紀年，即：建弘五年。²⁹ 筆者認為這一爭議在本文暫可擱置。因為無論是西元 420 年還是西元 424 年，都顯示出十方佛像的創作時間與晉譯《華嚴》的翻譯與傳播時間比較一致。
- (2) 此外，有學者根據吐魯番出土現存最早晉譯《華嚴經》的寫經殘片，以及有紀年可考的北涼宮廷寫經生道養的書法，考證出現存于旅順博物館藏（編號 LM 20_1454_27_08、LM 20_1519_06_15）的《華嚴經》殘片應該是在 426 年前後出現。³⁰ 寫經的時間肯定是早於經典傳播與被接受的時間，而且《華嚴經》從南朝傳播到吐魯番的時間應該晚于從南朝傳播到炳靈寺的時間。此外，晉譯《華嚴經》中《如來名號品》的內容非常靠前。在古代，大部經典的保存與傳播本

²⁸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2 頁。

²⁹ 王惠民，《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67 頁。

³⁰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第 247-249 頁。

身就是一件相對困難的事情。晉譯《華嚴經》很可能是一品一品的傳播，即翻譯一品流通一品。因此有很大的可能在《如來名號品》譯出後便傳播到了北方。

- (3) 從相似度來看，對比第 6 龕中的十方佛題名，晉譯《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中的十方佛與失譯（三十卷）版本《佛說佛名經》的十方佛相似度最高。但是《佛名經》的翻譯時間與來源本來就存有疑問。在《佛名經》中，存在著多個版本的十方佛，而且很多版本的十方佛中都存在著重複。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將《佛名經》中的十方佛視為一個彙集。因此，《佛名經》中的十方佛很難作為第 6 龕中十方佛名的源頭。況且，「南方智火佛」或者「智火佛」在《佛名經》的全文中難尋蹤跡，而「南方智火佛」在晉譯《華嚴》中十分明確。
- (4) 此外，我們也需要參考 169 窟特別是第 6 龕的主題與相關題材來分析十方佛題名的來源。這一問題我們將會在下一節中具體討論。

除此之外，建弘題記中十方佛刹的名號與目前已知其他版本的《華嚴經》（包括華嚴本部、支品經與眷屬經）都完全不同；建弘題記中十方佛刹的名號與其他含有大乘十方佛刹（十方世界）名稱的各類經典，例如各個版本的《阿彌陀經》、《無量壽經》等，也完全不同。這就涉及到了西元 4 世紀末期到 5 世紀初期十方佛的思想在河西走廊與中原地區的傳播情況，故不在本文討論。

四、建弘題記附近出現十方佛刹相關內容的原因初探

就這一問題而言，一方面，我們可以追溯到早期華嚴經學的傳播；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依據 169 窟建弘題記附近相關的壁畫與題名來分析十方佛像出現的原因。

就十方佛的傳播而言，在非常早期的經典例如《阿含經》中都很難尋覓蹤跡，《阿含經》中僅僅對「他方世界」³¹有多處描述。根據學者的研究，「十方佛觀在中亞為一成熟之禪觀，在《般舟經》與《思惟略要法…十方諸佛觀法》中諸佛皆沒有特定的名稱。在本龕中……引進了《華嚴經》系的佛名，其用意當不只是諸佛的名號而已，應有其禪法上的用意，亦即《華嚴經》中應有與十方佛觀對應的內容。」³² 在筆者看來，「《華嚴經》中應有與十方佛觀對應的內容」這一論點可以用來作為十方佛出現在第 6 龕之中的原因之一來看待。但除此之外，第 6 龕中的十方佛也是晉譯《華嚴經》經過翻譯後由南到北傳播的具體體現之一。在上文中，筆者曾經對晉譯《華嚴經》的傳播年代提出了討論。自後漢支婁迦讖開始傳譯，到東晉譯

³¹ 《長阿含經》卷 22：(CBETA 2019.Q3, T01, no. 1, p. 144c17)

³² 賴鵬舉，《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財團法人圓光佛學研究所，2002 年版，第 161-162 頁。

出《六十華嚴》乃至唐譯完《八十華嚴》間，《華嚴經》的翻譯大約經過了五個世紀。在這一過程中，各種版本《華嚴經》的傳譯工作從未停息，不論是華嚴本部還是支流別品對《華嚴經》的形成都有著很大影響力。這為早期華嚴經學的開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因此，早期華嚴經學的開展與晉譯《華嚴經》的譯傳也是建弘題記附近出現十方佛內容的原因之一。

建弘題記的本身就是造像題記，也自然包括了造像時的歷史資訊。在這類題記中，除了造像時間與造像主題外，通常都會顯示供養人或者是功德主的資訊。在建弘題記中，根據張寶璽的研究，可以識別出造像的目的，即：「乃妙斑匠，神儀重輝」。³³ 這裡的「神儀」指的便是第 6 龕的核心：無量壽佛三聖像（見圖五）。在題記的靠前部分中可以識別出的「亡第」等字眼，這也符合本龕的淨土主題。除了十方佛之外，在西方三聖像周邊也有類似規模的壁畫同時配有題名，例如有彌勒菩薩像、曇摩毗、道融、慧普等比丘像；也有供養人像，例如：博士南安姚慶子、侍聖廣甯邢裴等。其中曇摩毗、道融（見圖六）等僧人都是在西秦時期非常活躍的僧人。

根據《高僧傳》的記載，「時乞佛熾盤，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眾，即從毘受法……曇無毘既西返舍夷。」³⁴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曇摩毗來自「舍夷」，即：印度迦毗羅衛國。其中也講到了曇摩毗是一位禪師，所以才會「訓以禪道」。至於比丘道融，《高僧傳》有如下記載：「融便就講，剖折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³⁵ 道融與在中原地區的羅什本就有師徒之宜，而且羅什也非常欣賞道融根據新譯版本講授的《法華經》。正因如此，筆者認為道融對大乘經典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就羅什而言，與翻譯晉譯《華嚴經》的佛陀跋陀羅和慧遠之間本就有許多交集，因此在淨土窟中出現華嚴與法華的內容也就不是那麼突兀了。

除此之外，供養人像中的題名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博士南安姚慶子」中的博士這一官職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在西秦時期，博士這一官職的功能是掌管儒家經學研究和人才教育。³⁶ 因此題名中「博士南安姚慶子」及其多位侍生、清信的出現表明 169 窟的建造應該有著官方的支持，而且供養人的規模較大，這與 169 窟的大型建造規模也非常一致。此外，相鄰的壁畫中也顯示了大型的儀仗（見圖七），這也意味著功德主中有著西秦政權的高級官員。

³³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2 頁。

³⁴ 《高僧傳》卷 11：(CBETA 2019.Q3, T50, no. 2059, p. 397a27-b5)

³⁵ 《高僧傳》卷 6：(CBETA 2019.Q3, T50, no. 2059, p. 363c1-3)

³⁶ 齊然，《西秦政權治國策略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 30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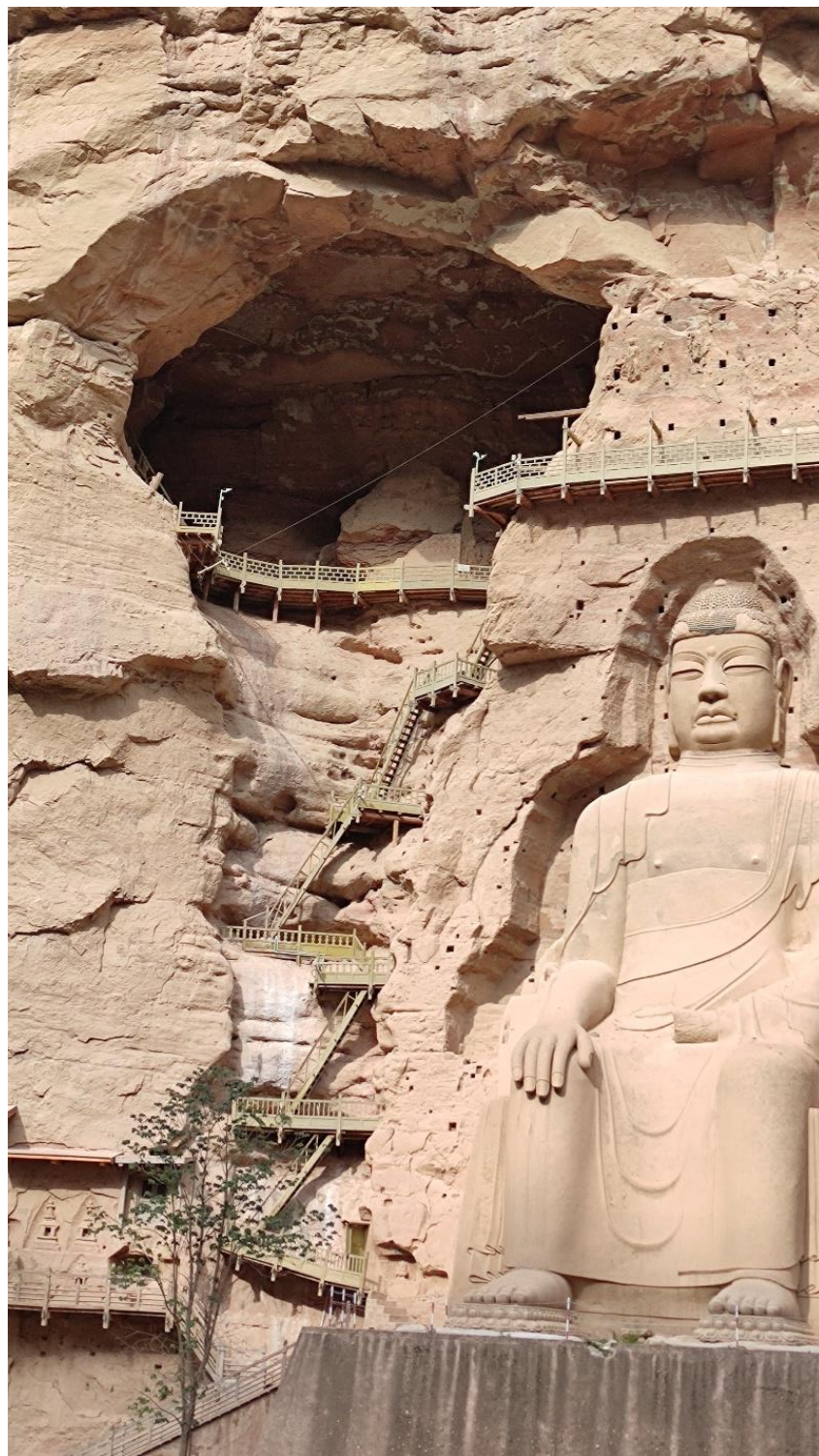
因此，根據建弘題記以及周圍的相關壁畫、題名，筆者可以做出如下結論：(1) 第 6 龕在建造過程中得到了西秦政權的支持。(2) 第 6 龕中有著諸多的供養人。(3) 第 6 龕中雖然以淨土為主題，但其內容並非局限於淨土。不論是禪僧曇摩毗還是比丘道融的造像與題名，亦或是三聖像附近的彌勒像與十方佛像，都顯示出多種早期大乘經典與題材在四世紀末期至五世紀初期出現在了河西走廊地區。因此，華嚴十方佛在建弘題記附近的出現並非偶然。在淨土為主題的佛龕與題記附近出現華嚴十方佛的壁畫與題名，不論是從當時大乘佛教的傳播狀況，還是同時期多位元僧人的相互交流情況來看，都體現了早期華嚴信仰與大乘佛教的其他信仰已經有了交流，並且幾乎是同步發展的。

五、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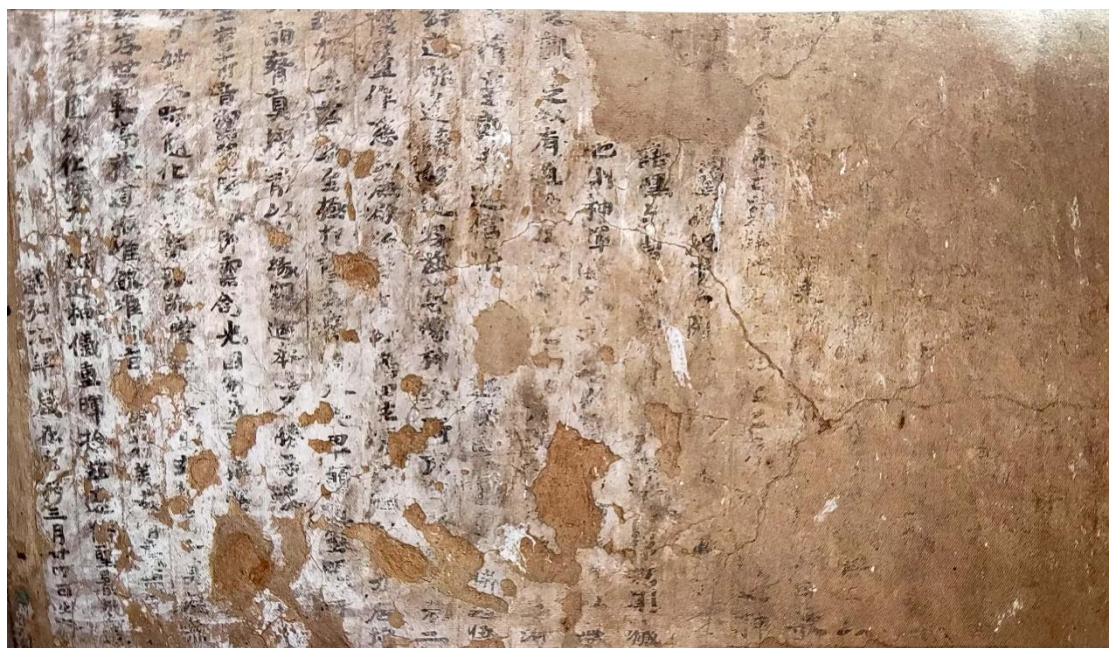
不論是從建弘題記，還是 169 窟中的其他內容來觀察，我們都可以窺測到西元 4 世紀末期至 5 世紀初期河西地區所呈現出的早期大乘經典與禪法經典傳播的狀況。其中，就第 6 龕中的建弘題記、十方佛像以及相鄰的壁畫而言，它們反映了在當時、當地與華嚴相關的十方佛已經有了一席之地。北方早期的華嚴信仰在這一時期已經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同時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早期的華嚴信仰與同時期其他的大乘經典與思想一起逐漸在河西走廊一帶生根、發芽。

由於本文撰寫時間有限，且對炳靈寺的相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在本文中，如有論點、論據或者觀點上的缺陷或瑕疵，還請各位老師提出修改意見，以便取得進一步的進步與提高。

六、附錄：



圖一：169 窟的外觀（作者本人拍攝）



圖二：建弘題記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頁。)



圖三：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的十方佛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1，敦煌麥積山炳靈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3 頁。)



圖四：依據圖三中十方佛細節的局部放大：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的十方佛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1，敦煌麥積山炳靈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3 頁。)



圖五：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無量壽佛三聖像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4 頁。）



圖六：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曇摩毗、比丘道融之像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出版，1989 年版，第 25 頁。)



圖七：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的供養人像與儀仗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15 頁。）

七、參考文獻：

(一) 經文、論疏等

- 《長阿含經》CBETA 2019.Q3, T01, no. 1.
《禪秘要法經》CBETA 2019.Q3, T15, no. 613.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CBETA 2019.Q3, T09, no. 278.
《佛說兜沙經》CBETA 2019.Q3, T10, no. 280.
《佛說佛名經》(30 卷本)CBETA 2019.Q3, T14, no. 441.
《高僧傳》CBETA 2019.Q3, T50, no. 2059.
《思惟略要法》CBETA 2019.Q3, T15, no. 617.
《坐禪三昧經》CBETA 2019.Q3, T15, no. 614.
《水經注》，酈道元，商務印書館發行，1929 年版。

(二) 書籍、論文、圖冊等

- 王惠民，《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67 頁。
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出版，1989 年版。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1，敦煌麥積山 炳靈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年版。
祁永龍，《淺析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第 113-115 頁。
馬德，《炳靈寺第 169 窟 6 號龕「十方十智佛」臆測》，《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第 93-99 頁。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第 217-261 頁。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
曹學文、丁萬華，《炳靈寺石窟第 169 窟「建弘題記」研究述評》，《敦煌學輯刊》，2020 年第 3 期，第 92-103 頁。
梁燕，《炳靈寺 169 窟北壁畫塑源流》，《中國美術研究》，2018 年 02 期，封二、封三。
莊希祖，《炳靈寺石窟題記的意義》，《中國書法》，2011 年第 2 期，第 122-123 頁。
陳海濤、劉惠琴，《炳靈寺石窟及其三個重要階段》，《西北史地》1994 年第 4 期，第 50-53 頁。

- 齊然，《西秦政權治國策略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 賴文英，《論炳靈寺北魏石窟的「十方三世佛」——以 126、128、132 窟為例》，
《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下）——2002 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
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第 332-347 頁。
- 賴鵬舉，《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財團法人圓光佛學研究所，2002 年版。
- 魏文斌，《關於炳靈寺石窟研究的幾個問題》，《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3 年，第 127-135 頁。

